



临沂大学博士教授文库
LINYIDAXUE BOSHI JIAOSHOU WENKU

环境变迁与 经济发展关系 研究

HUANJING BIANQIAN YU JINGJI
FAZHAN GUANXI YANJIU

许汝贞 魏鹏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临沂大学博士教授文库
LINYIDAXUE BOSHI JIAOSHOU WENKU

环境变迁与 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许汝贞 魏鹏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许汝贞,魏鹏
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10

ISBN 978 - 7 - 209 - 07839 - 9

I. ①环… II. ①许… ②魏… III. ①环境影响
—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8515 号

责任编辑:马 洁

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许汝贞 魏 鹏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 www. sd - book. com. cn](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239mm)

印 张 17.75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209 - 07839 - 9

定 价 3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546)6441693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相关问题研究的回顾.....	22
第一节 西方学者对环境与经济关系的认识.....	22
第二节 中国历史上对环境与经济关系的认识.....	33
第三节 当代中国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现状.....	41
第四节 当代学术研究的启示与存在的问题.....	51
第二章 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关系概论	54
第一节 环境的分类与特征.....	54
第二节 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	58
第三节 人文环境与经济发展.....	62
第四节 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关系.....	66
第三章 自然环境的区域分异与经济的区域性	74
第一节 自然环境与中国原始经济的产生.....	74
第二节 历史时期中国经济的区域性.....	86
第四章 自然环境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05
第一节 气候变迁对历史时期经济的影响	105
第二节 历史时期自然灾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30

第三节 水环境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黄淮海平原为例	150
第五章 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	182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与地表植被的变化	183
第二节 经济发展与水土流失	200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水环境变迁	205
第四节 边疆经济发展与土地的荒漠化	212
第六章 历史时期的人文环境与经济发展	218
第一节 人口变迁与经济发展	218
第二节 城乡聚落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	227
第三节 历史时期的水利工程与经济发展	238
第四节 交通运输环境与经济发展	246
结 束 语	262
参考文献	268

绪 论

将“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关系”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提出，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环境问题是目前全世界所共同面临一个严重问题，而环境问题的出现又是与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在研究如何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要检讨人类过往的经济活动。第二，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要求来看，研究人类以往的社会经济活动，也必须客观地认识自然环境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参与”，以及人类在从事经济活动中对“自然”参与的应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史学界出现的“环境史”，业已表明在历史编纂中“自然”已经进入“历史”。因此，从逻辑关系上认识，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全球环境问题的存在是催生史学界从环境史的视野研究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前提，而“环境史”的出现则是历史学对当今世界共同关注环境问题的积极响应。基于以上原因，本书以中国历史为例，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总结出有益于解决当今中国环境问题的经验与教训。

一、环境问题的提出

（一）20世纪以来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人类的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由来已久的事情。自原始社会起，人类为了生存，就在不断地同自然环境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以期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交往中，相当长的时期内只知道向自然索取，而不太知道应该如何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也很少考虑对环境的保护。在许多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的扩大以及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从世界范围看，如地中海沿岸、中东的两河流域、北部非洲、印度北部及南美洲的玛雅等地，这些原本富饶的地区则在人类的掠夺式

土地开垦和森林砍伐的过程中变成了植被消失、水土流失严重的不毛之地，古老的文明相继消亡。我国的黄河中游，特别是关中地区，原本也是森林茂密，土地肥沃，但是，因为长期过度的农业开发，导致了森林的逐渐毁灭，水分得不到保持，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原本富庶的关中地区变得千沟万壑，水旱灾害频繁，土地日益贫瘠，自然环境严重恶化，经济在这一地区严重衰退。总的来说，在整个农业文明时代，虽然农业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但是，由于人类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尚且不足，征服自然的能力有一定的限度，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矛盾还没有达到像今天这样尖锐的程度。不过，我们依然要看到，农业时代的环境问题虽然是由人类不合理的农业开发所引起，仅仅破坏了自然环境的表层生态格局，但这已足以在一些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地区摧毁人类数千年的文明成就，20世纪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更是令全人类感到了巨大的威胁。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手段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广泛应用，改变了古代社会对自然环境的力量对比，使人类陷入了一味征服、企图主宰自然的盲目之中。特别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二战结束，世界局势出现了相对平稳的局面，世界经济也由恢复迅速转入发展时期，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在经济增长的背后，却隐藏着严重的环境危机。许多工业发达国家普遍发生了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范围更大、影响更深、危害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公害事件在工业化国家屡屡出现，自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仅因工业污染引起的巨大公害事件就有8起：

1930年12月，比利时发生“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数千人因吸入被工业气体 SO_2 污染的有害空气而发病，导致60人死亡。

1948年10月，美国发生“多诺拉烟雾事件”，四天内有6000人因吸入被 SO_2 污染的空气患病，17人死亡。

1952年12月，英国发生“伦敦烟雾事件”，五天内4000人死亡，历年发生12起，死亡近万人。

1943年5月至10月，美国发生“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洛杉矶大部分居民患病，65岁以上老人死亡400人。

1953年，日本九州南部熊本县水俣镇发生了“水俣事件”，居民因食用了被氮肥厂排出的甲基汞污染的鱼患病，50多人死亡。

1931 至 1972 年,日本发生了“富士事件”,居民吃了被炼锌厂排出的镉污染的米和水发病,有 34 死亡。

1955 年以来,日本四日市发生“四日事件”,居民中 500 多人因吸入工厂排出的 SO_2 和煤粉尘致病,36 人死亡。

1968 年,日本发生米糠油事件,九州等 23 个县的 5000 居民因食用含多氯联苯的米糠油发病,实际受害人超过 1 万人。

事实上,就目前世界环境问题看,工业污染作为环境污染的主要致因,已经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构成了对整个自然环境的深度污染。工业生产所排放出的“三废”(废气、废水、废渣)造成的污染已经蔓延全球,从渺无人烟的南、北两极的冰层中环境工作者可以检测到工业有害物质的侵入;遍及欧洲和北美的酸雨,造成大量森林的毁灭;臭氧层的破坏、温室效应的出现均与工业废气的排放有直接关系。所有这些,已经严重影响到全球气候的变化,加之工业生产中原料材料、能源的过度开发,表明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构成对自然环境的立体破坏:大气、水体、土壤,乃至地下矿藏等无一例外地受到人类的侵扰。如果说以上所列的 8 大公害事件仅仅给人们一种强烈的感官冲击,那么,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部分国家的研究机构、专家等对一些国家环境损害成本的估算,则直观地表明了人类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十分惊人的。有专家对 20 世纪 80 年代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成本进行了估算,见下表:

表 部分国家的环境损害成本估算

国家及年代(年份)	环境损害类型	每年损失占 GDP 比例(%)
布基纳法索, 1988	土地退化引起的庄稼、牲畜、薪柴损失	8.8
哥斯达黎加, 1989	过度砍伐	7.7
埃塞俄比亚, 1983	过度砍伐对薪柴和庄稼供应量的影响	6.0~9.0
前联邦德国, 1990	大气、水、土壤污染, 生物多样性损失	1.7~4.2
匈牙利,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污染损害(主要是大气污染)	5.0
印度尼西亚, 1984	土壤侵蚀及过度砍伐	4.0
马达加斯加, 1988	土壤侵蚀等	4.0
马拉维, 1988	土地侵蚀引起的农产品产量损失	1.6~10.9
	过度砍伐的成本	1.2~4.3

续表

国家及年代（年份）	环境损害类型	每年损失占 GDP 比例（%）
马里，1988	土壤侵蚀	0.4
荷兰，1986	部分污染损失	0.5 ~ 0.8
尼日利亚，1989	土壤退化、过度砍伐、水污染、其他土壤侵蚀	17.4
波兰，1987	污染损失	4.4 ~ 7.7

资料来源：王树林、李静将主编：《绿色 GDP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大趋势》表 1-1，东方出版社，2001。

尽管人们在评估中采用了不同的评价方式，但结果是大同小异。根据该表所列的数据，环境破坏所造成的货币成本损失基本表现为：在工业化国家占 GDP 的 2% ~ 4%；东欧国家占 5% ~ 10%；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则在 10% 以上。如果以上数据是准确的，那么就说明这些国家在被评估期间，国家环境损失成本占 GDP 的比例，与这些国家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相当，甚至超出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特别是那些贫困的非洲发展中国家，因过度砍伐、水土流失等造成的环境损失成本占 GDP 的比例更是远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

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中国工业化进程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要晚得多，但是，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发达国家相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里，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了堪称奇迹的经济增长率。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在 10.1%；20 世纪 90 年代的年均增长率为 10.7%。20 世纪最后 20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一个奇迹。但是，这个奇迹的出现是以付出巨大的环境污染和资源为代价的。

首先，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不成比例。来自《财经》2004 年第 8 期统计数字表明，2003 年中国占全球的 GDP 和出口总额约为 4% 和 6%，但却消耗了全球 48% 的水泥、27% 的钢铁、35% 的铁矿石及近 20% 的铝和铜。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源的支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也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物质资源的高消耗实现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我国经济今后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资源短缺和经济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将日趋加剧。

其次，环境污染严重。截止到 2004 年，我国的废水排放总量为 439.5 亿吨，

超过环境容量的 82%，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 40.9%，75% 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①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每年沙化土地扩大面积从 560 平方千米增加到 2460 平方千米，我国有 18 个省的 471 个县、近 4 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1952 年，我国人均耕地 2.28 亩，2003 年人均减少到 1.43 亩。同时面临的土地问题是，利用强度加大，土地肥力降低，中低产田 20 世纪 60 年代为 2/3，90 年代则增加到 4/5。^② 在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仅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安全，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联合国《2002 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 GDP 的 3.5%~8%。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一些研究机构和专家对部分年份中国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进行了研究和估算。过孝民、张慧勤对 1983 年中国的污染破坏和生态破坏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污染（大气、水、固废）破坏损失占当年 GDP 的 6.75%，生态（森林、草原、农田、水资源）破坏损失占当年 GDP 的 8.9%，总环境经济损失占当年 GDP 的 15.6%。^③ 金明鉴等人对 1985 年的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果是：各项生态破坏损失占当年 GDP 的 12.47%。^④ 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对中国 1990 年的污染破坏和生态破坏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果是：污染破坏损失约占当年 GDP 的 2.1%，生态破坏损失占 5.4%，合计 $(7.5 \pm 2.0)\%$ 。中国国家环保局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对 1992 年的污染破坏损失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果是：当年污染经济损失占 GDP 的 4.5%。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对 1993 年的污染破坏和生态破坏损失进行研究计算，得出结果是：第一项损失占当年 GDP 的 3.16%，第二项是 6.87%，合计为 10.03%。世界银行仅对 1997 年中国污染破坏损失进行了研究，结果是：占 GDP 的 7.7%。虽然以上对我国环境破坏损失的研究中，存在着计算内容、口径和环境质量标准的种种差异，结果上也不免存在误差，但这种量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环境污染损失的基本状况。从几项结果看，我国因污染造成的损失占 GDP 的比例在 2.1%~7.7% 之间，生态破坏损失占 GDP 的 5.4%~12.7% 之间，两项目合计占 GDP 的比例为 7.5%~15.6% 之间，这个结果与前面国际上对发展中国家环

① 环球时报[N]. 2004. 2. 6.

② 颜彦, 王秀真. 科学发展观: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催生“绿色 GDP”[J]. 半月谈, 2004. 4.

③ 国家环保局组. 公元二〇〇〇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0.

④ 金明鉴, 等. 绿色的危机[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4.

境破坏损失的估算基本吻合。用这个结论去对比改革开放后 20 多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济增长事实上是付出了巨大环境代价的。解决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已刻不容缓。正如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所说:“‘十五’时期我国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也为此付出了较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这种过于依赖资源消耗带动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必须下力气尽快改变。‘十一五’时期要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保护修复生态环境,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强化资源管理,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①

(二) 20 世纪人类的环境保护思潮与行动

20 世纪环境灾害的日益频繁,首先使西方人开始从自己所制造的环境恶梦中醒悟过来,他们开始反思以往在经济活动中的种种行为。在检讨的过程中懂得了对自然的尊重,确立起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环境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不少发达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开始协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把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统一起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普遍加大了环境保护的投入。但是,人们对环境的保护从认识到行动,再到今天为人们普遍接受还是经过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首先是从民间开始。

1949 年,美国出版了伦理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著作《沙乡年鉴》^②。书中作者描述了大自然的绚丽多彩,记叙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搏斗,抒发了对自然崇尚的情怀。在《土地伦理》一文里,利奥波德把土地看成一个由人与其他物质相互依赖组成的共同体,表述了土地的生态功能,试图以此来激发人们对土地的热爱和尊敬。他认为:“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舒畅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作者向人们呼吁:“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已经知道(我希望我们已经知道)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但该书生不逢时,当时正值战后经济复苏时期,人们正在充满信心地征服和利用自然,生态学的意识和概念对人们来说十分陌生,该书出版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作为人类拯救环境,确切地说也为拯救人类自己的一种呼声已经发出。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逐渐发现了隐藏在富裕生活背后的各种危机,即人类在

① 马凯.中国经济增长的“六个立足”与“六个转变”.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06 年会,2006.3.19.

②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惠,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一味地征服自然所带来的环境破坏。1962年,美国出版了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①。书中卡逊阐述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用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化学杀虫剂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带来的危害,人类用自己制造的毒药来提高农业产量,无异于饮鸩止渴,人类应该走“另外的路”。这是一部划时代的绿色经典著作,它的出版对当时那些把剧毒杀虫剂作为提高农业产量“法宝”的人来说,无异于一种警告。日后的事实证明卡逊的预言,这些剧毒物对环境及整个生物链造成的巨大破坏是无法弥补的。该书是一座丰碑,标志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的新开端。它告诉人们关注环境不仅是工业界和政府的事情,也是民众的分内之事。围绕《寂静的春天》引起的广泛争论为民间环保运动的蓬勃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2年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组成的民间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②,首次正式向世界发出了警告:“如果让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报告第一次系统考察了经济增长与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科学技术进步间的关系,从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几个方面阐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的毁灭性灾难。报告中用各种数据和图表有力地证明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使人类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并将继续不断受到自然的报复。指出“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零增长”是罗马俱乐部发展观的核心。尽管报告中的观点有些片面和悲观,但其中提出的自然资源供给与环境容量无法满足外延式增长的观点,依然给人们一个很好的警示。从此,生态环境作为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它的论证为后来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增长的极限》和罗马俱乐部一起成为环境保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974年美国又出版了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③。书中指出:“环境危机令人忧郁地证明,在过分夸大了的生产率和现代的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后

① 蕾切尔·卡逊. 寂静的春天[M]. 吕瑞兰,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② 罗马俱乐部. 增长的极限[M]. 李宝恒,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③ 巴里·康芒纳. 封闭的循环[M]. 侯文惠,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面，隐藏着一个暗中活动的骗子。这种财富一直是通过对环境系统的迅速的短期掠夺所获取的，而且它还一直在盲目地累计着对自然的债务（其形式在发达国家里表现为环境的破坏，在发展中国家则表现为人口的压力），这个债务是那样大和那样具有渗透力，以至于在下一代人中，如果还不付讫，那么就会把我们赢得的大部分财富都摧毁了。事实上，现代社会的账本已经大大地超出了平衡，结果，大到不知不觉地，使一个大骗子一直在人类社会做着坏事。急剧变糟的环境污染过程是一个警告：这种哄骗的气泡大概要破裂了，索还全球债务的要求可能会发现，这个世界已经破产了。”这是继《增长的极限》之后，又一部倡导可持续发展的著作，作者虽然措词激烈，但充满理性。

民间环境意识的日益高涨和成熟，推动了国家政府及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美国政府开始对环境问题重视起来，并对书中提出的警告进行了调查，最终改变了对农药政策的取向，并于197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局。1972年，《增长的极限》发表，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133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声明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人类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这是人类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作出的一种清醒和理智的选择，是推动全世界携起手来共同行动保护环境迈出的第一步。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同年召开的联合国第27届大会把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此后，每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发表“环境状况年度报告书”，表彰“全球500佳”，并为每年的“世界环境日”分别设定一个主题，作为会议的指导方针。2006年是第37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是“善待地球——珍惜资源、持续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环境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各种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相继出现，环境保护会议也更加频繁。1971年，“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成立，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1971年2月，在伊朗的拉姆萨尔召开了“湿地及水禽保护国际会议”，会上通过了《国际重要湿地特别是水禽栖息地公约》（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简称《拉姆萨尔公约》。《拉姆萨尔公约》于1975年12月21日生效，规定每3年召开一次缔约国会议，审议各国湿地现状和保护活动的有关报告和预算。目前世界有100多个国家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

197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式成立。1977年联合国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世界防治荒漠化会议上首次正式使用了“荒漠化”这个词。这次会议有94个国家代表参加,“荒漠化”被定义为“土地具有的生物生产力减退乃至破坏,最终变成荒芜状态的现象”,后又重新被定义为“主要起因于不恰当人类活动的干旱半干旱和干旱半湿润地带的土地退化现象”。在这里,“土地”的概念包括土壤、水资源、地面状态和植被(包括农作物)等,“退化现象”是指因水蚀、风蚀、土沙堆积、自然植被减少等而出现的土地潜在生产力的减退。

1982年联合国在内罗毕召开会议,发布了关于环境问题的《内罗毕宣言》,该宣言在人类环境保护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自内罗毕会议结束到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10年期间,国际环境法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先后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热带木材协定》《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40多个国际公约、协定在这次会议后签订,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环境保护一体化的进程。如果说,从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内罗毕会议的10年是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繁荣发展的时期,那么,从1982年内罗毕会议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10年间,世界环境保护事业则又向成熟期迈进了一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全球性公害问题的加剧和能源危机的出现,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无法与环境割裂开来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忽视环境问题,只能给地球和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基于这种危机意识,可持续发展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1987年,受联合国委托,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WCED成员们,把经过4年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交给联合国大会,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一词最早出现于1980年由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制定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其后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范畴,并逐渐加入了一些新的内涵。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自然环境的综合的动态的概念,并从理论上明确了发展经济同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

1992年5月的联合国内罗毕最终谈判会议上,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

1993年12月29日《生物多样性公约》作为野生生物保护新框架生效。1994年12月19日,联合国大会宣布12月29日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1992年6月3~14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全球环境首脑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1989年12月22日召开的第44届联合国大会第44/28号决议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世界178个国家、17个联合国机构、33个政府组织的代表,103位国家元首和首脑。在这次大会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发表演说,明确会议目的为推广“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会议取得了重要成果,设定了地球宪章、行动计划、公约、财源、技术转让及制度6大议题,并成功地通过了《里约环境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签订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森林公约》等重要文件。这次会议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不可分割性被广泛接受,“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被否定。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第三次会议在东京召开,会议制定了《东京议定书》(全称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东京议定书》),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东京议定书》规定了工业化国家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全球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危险。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环境保护也在不断向前推进。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环境保护:一是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会议,成为各类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的缔约国;二是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尤其是近年来,面对近20年中国工业化进程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和资源浪费现象,各级政府均开始把保护和节约资源当作重要的工作来抓,许多省份把保护和节约资源作为政府的政绩进行考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目标。而后,在倡导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之一。中央已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列为“十一五”的重要目标。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环境问题是环境友好型社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2005年12月国务院正式发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环境保护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将考核情况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和奖惩的依据之一。2006年2月,我

国首部环境保护处分方面的专门规章《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正式公布实施。7月31日,国家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宣布,全面启动11个地方派出执法监督机构,包括5大环保督察中心和6大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十一五”期间,中国努力构建完备的环境执法体系,建立健全国家、省、市三级环境监控中心。9月7日,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在京联合召开发布会,发布了我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报告》公布了中国首创的两大绿色GDP指标——2004年全国环境退化成本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这些数字表明,我国环境形势十分严峻。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下一步,环保总局将重点研究如何利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结果来制定相关的污染治理、环境税收、生态补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等环境经济管理政策。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要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约束的矛盾。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两大主题。但恰恰在这个方面,我国正面临“不降反升”的矛盾。2005年6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战略目标;针对日益严峻的环保形势,2005年6月30日,国务院召开会议,第一次把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远期目标、工作安排、政策体制建设及协调保障机制等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提出来。2006年8月31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要求省级人民政府要对本地区节能工作负总责,把节能工作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并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和分工,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200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与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14家中央企业签订了节能目标责任书。之后,各省按此责任书,层层分解目标,北京、浙江、宁夏、山东等纷纷与重点耗能企业签订节能目标责任书,确保节能任务的完成。

全球性环境保护行动是人类对自己以往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不断破坏环境并带来严重灾难行为的直接否定,是对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入和科学的表现,表明人类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强烈愿望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

(三) 历史学对全球环境保护行动的响应

20世纪末期,正是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日益高涨的时期,西方史学界在历史学

的编纂方式上发生了新的变化，继政治史、经济史、文化社会史之后，出现了第四种类型，即环境史。就像环境保护思潮首先出现在美国一样，环境史也兴起于美国。如今，在欧洲各国，环境史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较为成熟，且成长十分迅速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环境史的出现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存在并非是偶然的重叠，准确地说是学术研究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积极响应。环境史是一门与当代环境保护运动密切相关的学科。“当今世界存在的种种严重的问题在 40 年以前就已清晰地表露出来了：不只是日经月久的循环往复的战争与冲突、权力财富的扩张以及社会的不公正；除此之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正处于生死关头。突然间出人意料地，我们同这个支撑着我们的生存系统开始彼此碰撞。我们在狂飙突进中破坏着自然。赫然呈于我们面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世界上有近乎半数的动物和植物物种濒临灭绝，这是一场在过去的 6000 万年中最大的生态灾难。在我们大学中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到这迫在眉睫的风暴。在历史学科或者人文学科中间几乎无人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所有的政治家，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对此也是茫然或漠不关心的。”这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和环境史权威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在《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一文中说的一段话。^①

西方环境史是在战后环保运动的直接推动之下，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一跃而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其生活水平远远超出了其他国家。于是，提升生活品质就成为公众的追求，环境质量的好坏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美国的环境污染事件却层出不穷，高科技的滥用所导致的新的污染——核放射性尘埃污染、杀虫剂污染的严重后果在美国表现得最为典型。另外，美国自然环境变化的激烈程度和破坏程度，也远远超出了欧洲。新大陆发现之前，处于原始部落阶段的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对美洲大陆自然景观的改变非常有限，自从白人踏上美洲大陆，这里的景观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进运动促成了美国的崛起，但也造成了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这些都激发了资源保护与自然保护运动在美国的兴起。1962 年，R. 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指出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环境污染：DDT 不仅能杀死害虫，还危害那些食用了经过食物链染上 DDT 的食品的人类。核试验和核战争不仅威胁人类的生存，还会渗透到遗传细胞中，造成发育的变异。

① 唐纳德·沃斯特. 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J]. 侯深, 译. 世界史研究, 2004. 3.